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30.00
ISBN 962-441-101-8

香港特區教育的再發展 論董特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

盧乃桂
曾榮光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公共政策論壇報告

香港特區教育的再發展

論董特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

盧乃桂

曾榮光

編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編者簡介

盧乃桂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暨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教授。

曾榮光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暨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鳴謝

本論壇之籌備及本報告之完成，有賴朱耀光博士鼎力協助。另外，本報告亦有賴鄧惠欣、楊曉頤協助編輯，編者深表謝意。

© 盧乃桂 曾榮光 1999

ISBN 962-441-101-8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 錄

前言.....	1
重點發言.....	2
張文光.....	2
曾鈺成.....	4
程介明.....	5
曾榮光.....	8
討論與回應.....	12
附錄	
「市民對香港教育政策的態度」電話訪問調查報告.....	22
參加者名單.....	38

香港特區教育的再發展

論董特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

前言

（周健林）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及香港亞太研究所得校方資助，聯合策劃了一系列公共政策論壇。整個論壇系列由社會學系劉兆佳教授統籌，目的主要是探討各項有關社會民生及福利的政策。主講者及出席論壇的嘉賓包括政府高級官員、專業人士、政策專家、學者及有關之工作者。

我們籌劃這一系列論壇，目的是藉著論壇所引發的討論，使政策策劃者和學術研究者能夠建立緊密和持續的對話，最終促成政府與學術界建立一種長期合作的夥伴關係。我們同時亦希望透過政策討論，向大學的同事推廣政策研究，使學術界更能廣泛地參與社會民生事項，使他們的學術和專業知識應用到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公共政策上。我們強調以理性作為決策的基礎，因此我們希望這一系列的政策論壇，能為越來越政治化的公共討論注入更多理性的元素，令政策制定的過程更趨完善，從而拉近政府與社會大眾的距離。

是次論壇以教育政策為重心，主題是「香港特區教育的再發展：論董特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是這一系列的論壇

的最後一次。這次論壇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鍾宇平教授為召集人，他們在論壇舉行之前，就市民對香港教育政策的意見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並於媒介發表。今次論壇我們邀請了數位嘉賓主講，包括程介明教授（香港大學副校長暨教育學系講座教授）、張文光先生（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席暨立法會議員）、曾榮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暨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及曾鈺成先生（民主建港聯盟主席暨立法會議員）。此外，參加這次論壇的人士還有一群中、小學老師、大學學者和對教育政策研究有心得的同工及朋友。

論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由盧乃桂教授主持，並由上述四位講者分別發言。第二部分是公開討論，由鍾宇平教授主持。經盧乃桂教授簡要地介紹了是次論壇的焦點後，張文光先生首先發言。

重點發言

張文光：我想強調，「重視教育」和「辦好教育」之間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從前者到後者，箇中牽涉到政策、方法和財政資源的問題。我想就五方面去探討其中的問題。第一方面是「資訊科技教育」。我相信政府在面對周邊地區之強大競爭時，已產生了危機感，所以，「資訊科技教育」取得二十八億的撥款。可是，這些撥款只集中運用在學校和師資培訓方面，我覺得這是一種偏差，因為它並沒有照顧到家庭、個人自學及終身學習的培育各方面，結果會做成「知識分化」，使家境有困難的學生因未能擁有電腦而落後於別

人。此外，有關「資訊科技教育」發展的師資培訓問題，中央統籌的做法是否能為老師度身訂造出適切和多姿多采的課程呢？這是值得研究的。

第二方面是師資教育發展的問題。我們都在談論要求老師在入職前必須先持有學位，並邁向專業化。我認為這樣還未夠全面，這個一面倒的看法忽略了教師在職培訓的重要。就舉特殊教育的訓練為例，加速培訓是有必要的。另外，一般在職教師的訓練也有檢討的必要。我會建議一些較有彈性的安排，讓老師可以根據他們的教學處境去選擇適合的時間和修讀課程。要達成這個理想，我認為終身學分制和大學聯網的構想是可行的。學分可以不斷積累，而且老師又可以自由參與由各所大學提供的課程。最終，若能把終身學習培養成一種風氣，那就最理想不過了。

第三方面是有關「私校」的問題。我想「私校」是有發展潛力的，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有五個重要的原則：公帑要用得合宜；學費要合理；家境有困難的學生也有選擇「私校」的權利；不要發展得過急；和學生必須有繼續就學的權利。與此同時，我們亦不應忽略現有的「直資學校」和「買位私校」。最後，我們更不應把「優質」這個詞變成一個「圖騰」，優質與否是應該從辦學的成果來判定的。

第四方面是「優質教育」的根本意義問題。我們都知道，香港市民一般都不滿意現時的教育狀況，連一些教育官員私底下也曾就子女所受到的教育質素表示不滿。《第七號報告書》提出了「教育增值」的概念，我認為這個觀念應該應用在每一個學生身上，每個學生都要得到照顧。至於用甚麼方法，那就只是手段的爭論而矣。但是，在執行時，有兩項原則是必須遵守的：第一，辦學者不能違反任何專業手則；第二，任何政策必須循香港的社會法則推行，學校獲得

自由辦學之同時，也需要提高其透明度，增加家長選擇該校的機會。再者，各學校應該發展其特色，使「優質教育」不會局限於單一的發展。

第五方面是關於教學語言的問題。據調查顯示，把學校分成英文中學（英中）和中文中學（中中）的語言政策受到很多市民反對。事實上，這個政策已造成了三種相關效應，就是「名牌效應」、「標籤效應」和有關學生流動的「骨牌效應」。可是，我觀察到一些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中中」學習英文的氣氛較「英中」濃厚，相信這個副作用並不是制定政策時所預料得到的。這個現象是好是壞，還有待時間去證明，但是，總可以作為日後檢討時的參考。教育再不可以是一潭死水，我們都對它有期望。教育需要改革，我們便要用開放的心靈去面對。

曾鈺成：我今天出席這個論壇的身分似乎與眾不同，因為我被介紹為政治團體的代表，但是，亦因為如此，我少了一點壓力。我不會以學術的角度去談論今天的題目，剛才張文光談了五點，而我只會集中討論其中一點，就是教學語言的問題。我們從盧教授的民意調查得知，大約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並不贊成政府批准一百一十四間中學用英語授課。可是，這條問題並未能確切反映出他們不贊成的是甚麼。譬如說，他們認為批准的數目太少，還是太多？抑或是他們根本認為政府不應該有這個決定？

我本身對教學語文的問題有幾個相當強烈的看法。第一，對於用母語授課的效果，我是毫不懷疑的，這是實際經驗告訴我的。我從小學五年級便開始在一個完全用英語授課的環境之下學習，除了中文課及中國歷史課以外，同學在課堂上甚少用中文交談。最後，我總算是成功地熬了過去。大學畢業後，我到了一所中文中學教書。到那時，我才發現上

課原來是可以那麼活潑的，共通的語言不單帶來暢順的交流，而且往往帶來很多弦外之音。我們不能夠跟別的地方比較，如新加坡及加拿大，因為香港並沒有實行雙語的環境。

第二，我認同香港這個特殊的環境是需要英文的。問題是，選擇那一種學習語言是學生及家長的權利，不應被剝奪。但是影響家長作出選擇的因素很多，他們是否能作出明智的抉擇還是未知之數。譬如說，學好英文的回報價值相對於中文高，因此，學校所選定或被派用的教學語言便成為判定學校優次的標籤。不單如此，縱使家長贊成母語教學，但他們的取向也會受這種標籤影響。所有贊成母語教學的人都或多或少受著這種壓力，令他們感到很尷尬，特別是被問及其子女是否在英文學校學習時，壓力便更大。這種壓力無形中剝奪了家長的選擇權。在這種情況下，母語教學就只得強制地推行。吊詭的是，母語教育的好處並不為一般家長認同，反之，這些父母，其中甚至有些是教育界的人士，卻無知的付上了子女用母語學習而取得更好成績的代價。

最後，我會簡單回應張文光對處理私校的一些看法。我認為最受爭議的地方是資助的政策，我所指的是資助那些非牟利私辦學校的政策。就這方面，我嘗試提出幾個問題讓大家於稍後的討論環節時一同去思考。我提出的問題是，政府應該怎樣去資助私辦學校？資助的同時，又應該怎樣監管這些私校呢？

程介明：我認為事情比我們想像的複雜，但是，我們又很想在短時間內獲得一個簡單而見效的解決辦法。在香港的特殊環境下，這個期望根本不可能達成。就教學語言來看，正如剛才曾鈺成所說，本土沒有一個屬英語的學習環境，這方面跟新加坡已經有很大的分別。若要勉強在課堂上用英語教學，整個學習過程就會變得生硬。但現實告訴我們，英語

訓練是不可缺少的。過去，我們多傾向於挪用一套現有的方法，不加思索就應用在教育上，「教學語言」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還有「目標為本」、「資訊科技」等等。我想，香港是需要一個多元模式的學習環境。我現在說不出那是個怎樣的模式，而事實上，我們是要共同努力去把這些模式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不斷嘗試。

接著，我想評估一下我們正身處在一個怎麼樣的形勢當中。總括來說，我們都感受到一種真正的危機感，說來可笑，這種危機感也得來不易，而且，若沒有了這種危機感，亦會失去改進的動力。所以，我們應該好好的抓著這個契機。有一些從外地來港的訪問學者對我說，香港的畢業生首先就要跟中國大陸的學生競爭，很多僱主都讚賞大陸的學生中文好、態度好，工資也不會要求得太高，甚至英文也比香港的學生好。事實證明，這個現象是存在的，但遺憾的是，這個存在的危機並未使香港的年青一代變得更努力。說得確切一點，我們的大學生都還是在醉生夢死當中。

香港的中學，特別是那些被定性為「第五組別」（band five）的學校，也存在同樣的危機。我們想不到這個組別的學生在離開學校之後可以做甚麼事情。他們讀不成書，僱主不會聘請他們做事。換言之，若教育制度不能為他們提供機會，家庭便成為決定學生的前途的主要因素。若沒有甚麼大變化，這種由家庭背景決定命運的結果便會一代傳一代的接續下去，這樣委實反映了教育制度的無能。

另外，談到教育在「資訊科技」上的投入問題，我個人對此並不十分樂觀。有人以為在課堂上多添置一些科技設施，便可以保證教學質素，但是很多研究結果均沒有支持這種論點。所以，沒有認清問題所在便無的放矢，加上投資在「資訊科技」上的費用動輒就一大筆，我不禁為此而擔心。

我的建議是要回到問題的核心，就是學生本身。我們先要把學生解放出來，讓他們的思維和想像力得以自由發揮，那麼一機在手，他們就自然會透過「資訊科技」所賦予的方便各取其需。最近，教育統籌委員會都開始意識到這個情況了。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很多，要是不找出問題的核心，一切的功夫都只會白費。

要成事就需要有策略，特別是我們現在面對這麼多的問題。其中一種策略是建立夥伴關係。我覺得在過去十年來，政府與教育界的關係淡薄了。君不見很多新政策和措施都缺乏結實的專業根據嗎？有別於一些地方如新加坡、台北、上海，我們只是從效果、從人的觀感去討論問題。另外一個策略是在眾多難題當中去選擇一些咽喉地帶先進行改革，大學入學方法是其中一個例子。此外，大學本身也需要改革，譬如說，專業知識學習在大學課程裏所佔的比例越來越重，相反，學生經歷的空間卻越來越窄。這種學習環境培養出來的學生，並非現時香港所需要的學生模式。

另外一個咽喉地帶就是升中派位的問題。我認為這種把學生分組（banding）的做法是不可以再存在的了，因為分組那個標籤效果所帶來的遺害實在太嚴重了。很多校長都對我說，他們學校今年是屬於甚麼二點八、三點八等等。我們已經把學生的質素變成了一堆數字來看待，這真是一個很悲哀的現象。要解決這個問題，在策略方面，我認為要把專業人士、專業的教師和校長集合起來，作為政府推行政策的同盟，希望儘快找到一些立竿見影的方法，讓大家都能在短期內拾回一點信心。大學入學和升中派位這些咽喉地帶是必須儘快解決的。

最後我要提出的一個咽喉地帶就是「教育目標」的問題。我想指出的是文化因素問題。在近來的討論中，我們都

很強調學生要有自信，可以有愉快的學習，這是很重要的，但卻並不代表學生毋需努力便可達成目標。用「德育」作為一個例子，「德育」是個人在群體裏的存在問題，是一個「此在」（being）中演化過程，而不是「認識」（knowing）的問題。建立自信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在東方如是，在西方也是如此，並不會有文化差異的問題。香港就正好可以承擔起融合兩種不同文化的使命，而我覺得這個任務是很迫切的。

曾榮光：我會集中談論三個要點。第一，我將會對照董特首的第一份及第二份施政報告，並同時把它們放在歷史的脈絡去看，就是回顧歷屆港督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第二及第三點是補充剛才已經談過的兩個政策——「優質教育」和「資訊教育」。

有關第一點——董特首發表的兩份施政報告，兩者之間很明顯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前者具前瞻性，以「共創新紀元」為口號；後者則較為保守，以「群策群力、轉危為機」來團結大眾為任。第一份的涵蓋面較闊，跟歷屆港督的第一份施政報告的取向相近，富有開創性。而第二份施政報告，我可以用「因循」和「補救」來形容它。報告中提到的「專業議會」、「學位化」和新入職教師的「專業化」及「語文分流」等等政策，都可以分別在一九八二年的《國際顧問團報告書》、《第五號報告書》和一九九零年的《第四號報告書》裏找到。或許，我不應該說它「因循」，因為它只是承擔了以往開出的一些未有兌現的「空頭支票」而矣。從一九八八年開始的直資計劃和私校的問題已是很明顯的例子。

另外，「補救」的政策也可從教育署迅時招聘二百五十名「資訊科技統籌員」便可見一斑。霎時間把數十部電腦放到學校裏去，教師本身已經忙過不了，哪裏有時間再兼顧這

些對他們來說是似熟仍新的東西？所以我說，招聘資訊科技統籌員是一個補救政策。此外，讓中文中學多添老師數目和補助金，又優先讓它們設立多媒體中心，也是補救政策的一種。可是，這種做法只會把中文中學標籤為次一等的學校。換言之，這種措施並非獎勵，而是懲罰。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去看兩份施政報告，我會問政策發展的方向在哪裏？

其實答案可以在第一份施政報告裏面找到，就是「資訊科技教育」和「優質教育」。這兩個可算是最昂貴的項目，故此，我在眾多的政策當中，針對性地選擇了這兩個來討論。我先從這個已經決定了投入五十億為基金的項目說起。

「優質教育基金」的設立可以說是一種偷換概念的手段。原因是在《第七號報告書》的諮詢文件裏根本沒有提過「優質教育基金」，只有一個「優質獎勵計劃」。兩者的分別，在於後者在理論上是一種事後的獎勵；而前者則是先撥款而後計算，這個運作方式很明顯是有矛盾的。很多學校能夠獲得撥款，是因為校方曉得怎樣寫一份優質的計劃書，實情或許與獎罰無關。最諷刺的地方還在後頭。《第七號報告書》很講求「問責」，在這裏我想問，這為數五十億的「優質教育基金」批款方式的「問責機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又在哪裏呢？

美國威斯康辛州大學教授 Fred Newman 曾經就「問責機制」發表意見。他認為一個運作得好的機制必須具備四個條件：第一，它需要有一個資料庫；第二，它可以按這個資料庫所提供的資料，對實況提出標準並作出評估；第三，它需要擁有評估的權威；第四，它需要由一個組織執行獎罰的工作。我質疑「優質教育基金」的批款程序是否有這種機制。結果，事後的優質獎勵計劃演變成事前批核的計劃，這個決定完全是和整個質素的問責文化背道而馳的。

最後，我會套用一個目標與手段的分析方法，去檢討「資訊科技教育」。我們已經進入了以資訊科技拓展經濟的年代，社會所需要的勞動力基本上跟以往不同。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一些靈活、有協作能力及有多元化知識的工人。我想問，現行的教育制度如何去滿足這種需求？恕我膽大的說一句，單單在學校擺放數十部電腦絕非靈丹妙藥，並不能解決這些迫切的問題。那麼，良方究竟在哪裏？

首先，我認為要提高整個教育制度的生產力。香港能夠有一些優秀的學生進入哈佛或者史丹福大學，那麼為何中、小學不能輸送百分之十八點五有質素的學生進入大學？是否我們的教育制度一直在窒息著這些學生的潛能？盧乃桂及鍾宇平教授跟我一起做過的一項研究顯示，「分組」的教育體制實在禍害學生到了一個嚴重的地步。譬如說，按一項分隔指標（segregation index）顯示，香港是五十五，較新加坡的三十三和美國及加拿大的二十左右為高，這是「分組」的教育體制所做成的後果。我們很早便把學生分隔，使一些在進入中學時成績較差的學生即時被定性。這一群一早被定性或窒息的學生，是否可以反過來成為董特首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所提及的「不竭的寶藏」？我們如何去發掘他們的潛能，並且掘得更深更廣，使他們可以投入將要發展的資訊科技經濟裏去呢？這是我提出的第一點。

第二點，正如剛才我已經講過，我們需要一些更靈活（flexible）、適應力更強（adaptable）和更曉得融會貫通（convergent）的學生。要靈活就必須如程介明教授剛才所說，把他們解放出來。但是，我要追問，要在哪方面去解放他們呢？之後又把他們解放到哪裏去呢？我個人認為他們必須要從課程中解放出來。我們現在的課程是否只注重知識的量，而忽略了質的重要呢？當學生從課程中解放出來以後，

他們又要到哪裏去？我的答案是解放到「思維」裏去。我們不應讓學生只把時間花在背誦知識，而應該用多一點時間去思考。

談到這裏，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思想」跟「資訊科技教育」有甚麼關係？又或者我們需要學生如何看待操控電腦的能力（computer literacy）？我想引用一位學者 Noble 的觀點說明這種關係。他提出了與電腦有關的四種「掌控能力」（literacies）。第一種是「辨識消費能力」（consumer literacy）。作為消費者，特別是在這個年代，我們必定會接觸到有關電腦的東西。但是，消費者並不一定對電腦有深入的認識，使用提款機便是一個例子。第二種是「掌控工作能力」（worker literacy）。Noble 這樣說過：「一部聰明的機器會製造出一個不怎樣聰明的工人。」（“A smart machine creates an unsmart worker.”）意思就是說，工人只需要曉得如何使用那部機器而不需理解內裏的運作，亦可以完成他／她的工作。第三種是「履行公民能力」（citizen literacy）。我們可以做到透過資訊科技所提供的方便來投票。換言之，市民不需要再上街投票。這樣是否意味著這種投票行為可以被取代？第四種是「學生解讀能力」（student literacy）。若按上述所言，我們只需要曉得如何操作電腦便可，那麼，我們是否還需要在學校裏設立電腦科目去教導學生如何編寫電腦程式？

在還沒有總結這四種「能力」與「資訊科技教育」的關係之前，我想再多提一點。據一些研究「人工智能」的結果顯示，電腦是絕不能取代人的思維，因此，我認為要把「資訊」與「知識」分開，處理「資訊」並不同進行思維活動。我們教導學生的目的，是要訓練他們思考，而不是單單教曉他們去運用電腦。我們所應注重的不應單單是獲得知

識，更重要的還是「教與學」的過程。回應程介明教授的說法，那是一個「此在」（being）的演化過程。最可貴還是在「教與學」的過程中「主體」與「主體」間的交往過程（process of interaction）。

討論與回應

四位講者發言完畢後，主持鍾宇平教授建議先由列席嘉賓回應講者的言論，其後再邀請與會者發言。

何灝生：我認為香港的教育很失敗，學生不論在職業技能（job skill）方面的掌握，又或者在待人處事（life skill）方面都有不逮之處。原因有四個：第一，太過急功近利，只求即時的結果而忽略過程的重要性；第二，重量不重質，製造數字瞞天過海，自欺欺人；第三，太重視長官意志，由上而下，不理民情；第四，分組制度的禍害，學生的命運一早被判定。我贊成校內分班，當學生的成績有改進時，便可轉往較好的班別。

黃顯華：我認同剛才程介明的看法，要談教育政策就必須從策略入手。我覺得先要分析現狀，指出問題，提出方案，然後再討論政策的安排。施政報告只提及很多正在推行的政策，卻沒有清楚指出成效，也沒有分析現狀，當然就不能夠提出問題了。現在，我想提出的一個問題，也就是教育委員會曾經研究過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學生到小學三年級，便開始失去學習的興趣？小學教育出現甚麼問題？我認為原因有兩方面。第一，我們面對篩選教育和普及教育可能衍生出來的問題之前，未有好好的作過準備。第二，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我們在這個過渡時期並沒有讓教育界當家作主。其餘的還有資源分配問題，分配給小學的資源較大學

少，反映我們並不重視基礎教育，結果便造成了小學教育的失敗。

曾鈺成：根據我的觀察，很多教師討厭學生，又討厭教學，那又怎可以教好學生呢？我想我們做研究的是要切實瞭解一下老師為甚麼會揀選這個行業？他們如何處理日常的工作？他們的工作態度又是怎樣？

曾榮光：我同意黃顯華所提出的問題，就是為甚麼教育制度在小三時已把學生放棄？我們對那些不想學習，而老師又不想教的學生從未實施過積極的「分歧待遇」。我們應該從小三開始便向有需要的學生給予輔導。

張文光：我認為現今這個教育制度製造了一個充滿埋怨的環境。在這個環境裏面，不論老師、學生、家長都被教育制度所製造出來的大車輪所壓制，這個大車輪就是課程、考試和功課。除非可以把他們從這個大車輪底解放出來，否則，他們仍然好像身處鬥獸場一般，不討厭教學及學習才怪。

程介明：其實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學生本身。過去，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那些與學生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上。我曾經做過數項質性的研究，追蹤一些有學習問題的學生，看看他們背地裏發生了甚麼事情。結果發現，他們每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所以，政策研究最後也應該關注到每個學生的不同變化才算是對的。

馮文正：我先有一個回應。剛才大家都說，我們的小學出了問題。我想請教育統籌委員會能多一點關注及研究幼兒教育的發展及父母的看法。另外，我有三個問題，其中兩個希望程介明回應。請你就「資訊科技」對大學的衝擊和教學語言的問題多說一點。第三個問題是有關香港職業教育的發展，我想請各位講者發表你們的看法。

鍾宇平：或許我們先請其他與會者發言，讓各位講者多一點時間思考，之後再回應馮文正的問題。

盧乃桂：我所關心的是學生、老師和他們在課堂上交往的過程，因為那正是「質素」產出的所在地。只可惜，去年曾經提及過的一個龐大的教師專業化計劃到現在已變得無影無蹤，我們這些在準備回應的院校不知應該如何是好。這是第一個問題。另外就是教師的在職培訓問題。不知道那裏來的一個大笑話，政府突然攪出了一個招標制度，讓有興趣從事老師培訓的人士出標，原則是「價低者得」。這樣只會做成質素下降，原因很簡單，以低價投得標者，他們在設備及人力的投入自然不會多，這會影響產出的質素。再者，那些本來就有培訓經驗及設備的院校，鑑於本身已有繁重的工作，犯不著跟別人爭長短。故此，政府投標以價低者得的方式撥款是很危險的。

另外，我還有多兩個問題。施政報告裏提到教師要專業化，於是我們便成立了「教師專業議會」，一九八二年的《國際顧問團報告書》也鼓勵我們這樣去做。這裏的問題是政府一次過撥二千萬去做這件事情，是否意味著這個組織將會由政府官員及一些個別的专业人士組成？我恐怕他們連去瞭解文件的時間都沒有，又怎會知道教育界發生甚麼事？此外，一次過撥款是否意味著自生自滅的狀況？老實說，在香港這個環境，我們可以很快就把兩千萬用掉。最後，我想談談教師的質素問題。我認為老師並不知道甚麼是「特殊需要教育」。「特殊需要教育」就是對個別學童的需要及問題有洞察力，不要劃一地說他們都是懶惰、愚蠢、頑皮，甚至是喜歡鬧事的。

鍾宇平：現在是講者回應的時間。

程介明：我的回應有三點。第一，有關教學語言方面，我相信人事方面的一些變動，會給教學語言政策帶來一點生機。第二，職業教育與正規教育之間的分別的確是越來越模糊。鑑於知識不斷膨脹，職業模式和形態也不斷產生變化，以前所謂的「一技之長」已不合時了。我想，政府是需要考慮這個問題的。第三是有關大學受「資訊科技」衝擊的問題。同樣，因著「資訊科技」的發達，公開大學與正規大學的界線也漸變得不太清楚。正規大學舉辦的網上課程、遙距課程就是為了爭取市場，因為它們正受著很大的威脅。現在的正規大學可算是靠考試制度維繫著，否則，大學的收生概念便會受到影響，甚至連中學的課程設計也會受到牽連。這種連鎖式的反應很可能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曾榮光：我想就職業教育的發展提出兩點。第一，現在我們的工作間裏面的工序是很富彈性的，標準化的職業教育概念是已經過時了。第二，現在的科技日新月異，今天訓練出來的學生極可能已經不適合明天的需要。我想引用 Martin Carnoy 的建議，他認為職業教育的比重應該減低，取而代之的乃是加強通識教育的內容，為要訓練一些曉得思考、批判的學生，那就是我們所說的通才教育。

張文光：不論職業教育還是文化教育，我認為都不能夠保證學生將來一定有一份好的職業。事實上，世界經歷的變化較學校快，所以，我們不但要回應外間的變遷，而同樣重要的，就是在自己所屬的範圍內不斷鑽研。

曾鈺成：我認為應該取消職業教育，正如何樂生剛才所說，那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建設，是一早便把學生釘死的例子。

楊立門：我是代表教育統籌局的。每一個人對教育都有不同的期望，所以，聽到那麼多不同的意見，甚至是不滿意

現行教育政策的聲音，我並不感到驚訝。我不打算在這裏為現行的教育政策辯護，反而，我希望能藉此多聽，並且在制定政策時能充分考慮各方面的意見。大體上，我都認同各位所提出的問題。但是，某些方面是需要澄清的。就教育政策的制定而言，我們參考過不同國家的情況。另外，教育目標也很清楚說明我們的方向是甚麼，譬如要學生接觸多一些不同的資訊；讓學生多一點空間，擴闊他們的世界觀等，這些都是以學生為本位的目標，跟其他國家沒有多大分別。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去執行以達成這些目標。同樣，教師的訓練、資訊科技的應用、母語教學的問題、撇除標籤效應等等，都需要大家多給意見，建議如何落實執行。同時，教育當局需要扮演一個平衡的角色，包括如何使家長和學生多些自主之同時，又不至於過分干預。最後我想回應曾榮光教授所提及有關「優質教育基金」的問題。其實，這個「基金」與「獎勵計劃」是並行的。日後我們會陸續公布更多有關籌備「計劃」的詳情。「優質教育基金」的設立所不同之處，是在於它是致力幫助一些有理想的學校去達成其優質的目標。當中，我們是有一個審察機制的。

盧乃桂：我想澄清一點，楊立門先生剛才說，是次會議的布局有點像把他放在自辯的位置上，這個並非我們的意思。約八個星期前，我們曾以信函邀請教育統籌局局長、助理局長、教育署署長、助理署長，甚至新任署長出席是次論壇，結果只有楊先生你一位來參加。我對有關官員如此的反應實在感到有點詫異，但同時，我又很欣賞楊先生積極參與的態度。

鄧薇先：我想從這份施政報告的口號談起，這句口號是「群策群力、轉危為機」。很多教育工作者都很忙碌，工作得很辛苦。我們是否各自做一些不同的東西，以致沒有連貫

性，因而達不到我們預期的結果？換言之，我們是否需要群策群力，集中地去處理我們周邊的問題。這是我提出的第一點。第二點是轉危為機。程介明說了很多遍，我們的教育正在面臨危機，但是，我感覺到很多教育工作者並沒有這種危機感，沒有很多人願意參與類似的研討會。故此，我的問題是怎樣才可以群策群力？另外，怎麼樣的情況才算是危機？

剛才黃顯華教授提過小學的問題，這個問題提出過很多次，但反應仍然是那麼冷淡。我們都說學校需要一些專業的老師。但是，甚麼是「專業」？老師只知道有很多東西要做，卻不知道如何才可達致「專業」。剛才張文光先生提出的或許是一個答案，就是要終身學習和不斷接受培訓。但是，甚麼質素的人去培訓專業老師才是正確呢？校本培訓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如何呢？大學可以在這方面如何跟中、小學合作？我想，實際瞭解老師及學生的需要才是關鍵所在。

程介明：我對「優質教育基金」的設立是肯定的，因為它讓教育工作者開始擁有夢想。現存的問題是如何把這些夢想通過「問責」的過程得以實現，這是我回應的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專業」的問題。有很多問題我們並不能代替學校本身去推想。所謂「專業」的意思就是為所服務的對象著想，我們要尊重學校的自主。

楊立門：我相信，其實很多老師都很專業。但是，當要面對一些現實的問題時，他們不能不放棄那些專業的建議。譬如說，老師可能都贊成母語教學，但鑑於考慮到父母是否會把子女送到學校的問題，他們很多時都只能順應潮流，接受英語教學。

程介明：我所觀察到的事實是這樣的。很多學校在過去幾年已經有計劃逐漸過渡到用母語教學。但是，是次教學語言的政策卻一刀切地推行母語教學，把學校的計劃打亂了。這是個不可不承認的事實，我們並沒有幫助母語教學，反之，我們把它削弱了。

黃美美：我是德貞女子中學的校長。德貞女子中學是一間傳統的中文中學，我可以很清楚的說，現時的語言政策根本就沒有幫助過母語教學的推行，它只做成一種分化現象，在資源和金錢分配上，中文中學都得不到好處。譬如說，舊有中文中學的校舍設計根本就容納不了施政報告裏所建議的多媒體教室，所謂讓中文中學優先裝置設備，那只是口號而矣。現時的語言政策唯一的一點好處，就是使英文中學感到自危地去學好英文，同時也讓中文中學得多一點撥款為中一同學開設英文班。可是學生就連課餘玩耍的時間都沒有了。另外，在「資訊科技教育」方面，我們接到指示要去為購買電腦的事宜不停議價。長此下去，我真不敢想像學校將會變成怎麼樣。

何瑞珠：回應剛才鄧薇先所提及群策群力的問題，我的觀察是這樣的：在上的決策者就在群策；老師和家長就在群力。當我們談及老師的「專業化」時，我們有否在制定政策時以老師的實況作主導？反觀我們現在每一項政策，沒有一項是由學校自決的。在家長方面，現時的「資訊科技教育」政策並沒有考慮不同階層的需要，結果，這個一刀切的政策使擁有這類文化資產的家庭變得更強；反之，屬低下層的家長便顯得很無助。

陳玉楷：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孩子的書包可不可以輕一點？到現在都好像沒有一個答案。第二個問題是，學校是否要向公眾交代它們所做出來的成績？學校一向是沒有這

樣做的。第三，我相信沒有人比家長更關心兒女的學業了，但是，教育制度又有甚麼機制讓父母參與子女的學業？學校的透明度又在哪裏呢？家長在這方面顯得很無知。我認為我們需要讓家長多負一點責任，幫助他們建立家長教師委員會，輔導他們如何運作，讓家長和老師有更多交流的機會，相信這樣對學生必定會有幫助。

張文光：陳玉楷校長所提出的問題是值得重視的，我將於下一個星期的立法會動議討論這個問題。但是，我現在有一點想指出的是，正如一些從外地來港的教育學者所言，我們都說香港的教育怎樣不好，但是卻沒有談及各自的責任。我認為我們每一個都有責任，包括教師、校長以至家長和書商。

彭新強：我想提出「救救學生」、「救救老師」和「救救學校」。上一個月，我四歲的孩子就因為考試壓力的緣故而失眠。我們需要救救孩子，這是第一點。第二，我們有太多的教育政策，使學校及老師應接不了。老師、學生和學校都需要空間去思考，過去所推行的政策實在是太緊密了。

許為天：我認為在改革過程當中，課程是很重要的。我們要知道教些甚麼。現在的學生除了考試技巧之外，沒有工作技巧，也沒有生活技巧。另外，我認為在每個政策推行之前，應該讓大眾有半年的時間討論。最後，我又不覺得現時的情況是那麼悲觀，因為有很多老師都正在努力當中，而「優質教育基金」委實也鼓動了一些生機。我建議在政策推行方面不應一刀切，應讓老師多一點空間去嘗試不同的方法。

郭偉祥：作為前線工作者，我亦希望能對政策的發展有所貢獻。第一，我極力主張母語教學。經驗告訴我很多老師的英文並不是很準確的，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英文的重

要性。所以，以母語教學之同時，我們應該投入資源，送一些老師到外地接受教授英語的訓練，讓他們回來後用之於香港。第二，我認為香港的教育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有很多校長都是非常之積極，問題是每間學校的取向都各有不同，我們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我們不能硬把外國的經驗套在香港所有學校身上，最主要的還是懂得掌握教與學的過程，使用適合的課本，讓學生明白。最後，香港的學生實在需要更多思考的訓練，使他們具備分析力，否則，香港的前途真的會變得坎坷。

陳展鳴：我會以家長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我都把兒女送到國際學校去讀書，原因很簡單：師生比例是一對十五，日常只是做作業，又毋須面對考試的壓力。反之，香港學校的師生比例是一比四十或以上。我們又怎能在這種環境下要求老師對個別學生付出足夠的關心呢？這個是結構問題，甚麼政策都只是謊話。

鄧惠欣：我看見的是這樣的一張圖像：剛才所提到的小孩就是一個生命（being）的問題，而書包就代表了知識（knowing）的爭取。面對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過程，我們都似乎不斷地回應外間的改變，反而忽略了對學生生命成長之關懷。我們或許想快一點找到相對應的政策以呼應外在的要求，因此，我們需要學生知道（know）多一點。但是，學生的個體生命成長，甚至要培養出曉得分析及批判的思維卻是需要時間的孕育，那是要慢慢來的。前者是量的要求；後者則是質的取向。前者把學生放置在一個不斷加快的輸送帶上；而後者卻需要把這個輸送過程延長。我想問，培育學生是否快與多就等於成功？又或者剛剛相反才對？

孔繁盛：我想問，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有多廣和多深的考慮專業人員的意見？另外，在執行政策時，政府有沒有存檔

說明哪些做到了，哪些做不了？政府又是否關注到一些學術研究報告的建議？

鍾宇平：最後請各位講者作出總結。

曾榮光：我只會提出一點回應程介明對「優質教育基金」的看法。「優質教育基金」或許會為整個教育制度帶來一點生機，但同時，它亦有可能收緊學校的發展。現時的實況是，很多校長要求老師在繁忙的工作之餘，再撥出時間撰寫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計劃書。他們很快就形成一種觀念，就是說，申請不到「優質教育基金」就等於不「優質」一樣。我覺得這並不是一種優質教育文化，而是一種公關文化。

曾鈺成：我們不要自欺，以為政府已經撥出了很多資源，只要找到一條適合的鑰匙，甚麼事情都可以解決。事實上，相對於別的地方，我們在教育的投入是很有限的。

張文光：我會這樣去總結香港的教育：政府用落後國家的教育經費去投資；用社會主義的中央管理制度去尋求資本主義的自由和創造。這是一定做不到的。

程介明：我的總結回應有兩點。第一，我想我們要曉得去取捨。並不是每件表面看似好的東西都要去做，有些時候，我們要曉得如何說不，這包括政府及官員在內。第二，我很欣賞剛才張文光的一句說話，大概的意思就是說，我們要先從自己做起，不要只曉得批評。我想這就是一種主人翁的精神。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除了批評之外，他們也很想聽到有用的建議。我想，若每一個人都有這顆心的話，整個局面就會很不同了。

附錄

「市民對香港教育政策的態度」 電話訪問調查報告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及副所長曾榮光教授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期間委托了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以瞭解市民對教育政策的看法。是次調查成功訪問了 981 名成年市民，有關抽樣及訪問成功率詳見「抽樣方法及調查概況」。本調查是以董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有關教育政策的施政為基礎，訪問市民對各種教育政策在「政策手段」（policy means）的取捨及「政策目標」（policy ends）的成效的意見。

調查目的

此問卷調查的問題大致可分為兩方面。第一方面是有關「政策目標」的成效，目的是調查市民是否相信有關的「政策手段」可以有效達到既定的「政策目標」。這包括問卷調查中的題一、題三、題六、題七、題八、題十一、題十二、題十三及題十四。第二方面是有關「政策手段」的取捨，目的是瞭解市民是否贊同一些教育政策手段的抉擇及取捨。問卷調查中的題四、題五及題十是詢問市民對政策手段的抉擇，而題二及題九是瞭解市民對政策手段的取捨。

市民相信教育政策的成效

調查資料顯示市民對教育政策持相信態度，九題有關市民對「政策目標」成效的看法的問題中，八題有過半數的市民表示信任。其中，八成（79.2%）的被訪者相信及非常相信小學全日制可以提高小學教育的質素。接近七成（69%）被訪者表示中學增設兩位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可以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大部分（84.4%）被訪者指出學校採用資訊科技可以提高「教」與「學」的成效。但市民對再培訓計劃的成效屬半信半疑：43.2% 表示相信再培訓計劃可幫助失業人士提高轉工機會，而 48.5% 卻表示不相信。

市民對「政策手段」的抉擇與取捨態度分歧

八成（80%）市民贊成大學錄取在非學術領域表現出色的學生。對於政府使用更多公帑來資助私立學校，52.4% 被訪者表示支持，但亦有三分之一（36.7%）表示反對。同時，有兩項「政策手段」是有過半數的被訪者表示不贊同。其中以「政府批准 114 間中學用英語授課，而其他中學全部要用母語授課」一題，市民的態度最明顯，有 67.7% 反對。亦有 58.6% 被訪者不贊成「政府略為增加每班小學的學生人數以達致小學全日制的目的」；但要留意的是，贊成的市民也有三分之一（34%）。市民在「政府將 150 個本地學生的大學學位給予成績優異的內地學生」一題中出現明顯分歧，當中半數（50.9%）被訪者反對而有接近半數（44.3%）贊成。

市民不滿特區政府在過去一年的教育政策

調查顯示大多數市民對特區政府在過去一年的教育政策表示不滿意，佔受訪者 46.1%，表示滿意的不足三分之一（32.2%），而 21.7% 則不表示意見。

市民的教育程度愈高對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愈抱負面態度

在「政策目標」成效的九題問題中，八題均顯示受訪者教育水平愈高對教育政策成效愈表質疑。在「政策手段」抉擇的五題問題中，有四題出現顯著的負相關，即受訪者教育程度愈高便愈不贊成政府政策手段的抉擇。最後，教育水平愈高者亦愈不滿意特區政府過去一年在教育政策方面的施政。總括來說，教育程度愈高的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愈抱負面態度。

年輕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抱負面態度

在「政策目標」成效的九題問題中，有八題顯示受訪者年齡愈輕對教育政策成效愈表質疑。在「政策手段」抉擇的五題問題中，亦有四題出現年齡愈輕愈不贊成教育政策的抉擇。最後，調查資料顯示年齡愈輕的受訪者對特區政府過去一年在教育政策方面的施政愈不滿意。

特區政府需顧及教育程度較高或年青市民的需要

「市民的教育程度愈高對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愈抱負面態度」及「年輕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愈抱負面態度」兩項調查結果顯示特區政府需注意教育程度較高或年青市民對教育的不滿、不贊同及不信任。

家長反對分配 150 個大學學額予內地學生及不贊同大學以非學術成績錄取學生

調查資料顯示家長跟非家長在一般教育政策的態度上沒有顯著差別。唯兩項跟大學收生有關的教育手段抉擇，家長

跟非家長有明顯分別。家長較非家長傾向反對分配 150 個大學學額予內地學生及較少贊同大學以非學術成績錄取學生。因此，特區政府在決定此兩項政策時需照顧家長的意願。

小結

(1) 不滿

整體而言，多數香港市民不滿意特區政府過去一年教育政策的整體表現；其中教育水平愈高及愈年青的市民的不滿程度愈大。

(2) 不贊同／贊同

市民對「語文分流」和「加每班人數以換取全日制」兩項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表示明確不滿。相反，香港市民對「大學錄取在非學術領域表現出色的學生」卻大表贊同；另外，也有近半數市民贊成「將 150 個本地大學學位給予內地優異學生」。但值得注意的是家長較非家長更傾向不贊成這兩項政策。

(3) 信任／不信任

過去一年董特首政府的多項政策上均大大失去香港市民的信任，但可幸的是在教育政策上，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成效的信任仍然很強。但值得關注的是教育程度愈高和愈年青的被訪者，卻愈不相信特區政府教育政策的成效。這可顯示香港市民整體對教育政策的信任只屬一般的民粹主義（populism）（這亦是電話民意調查所能做到的），但在學歷較高的市民心目中，這種信任卻較難維持。

抽樣方法及調查概況

是次電話調查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與香港亞太研究所合辦的「公共政策論壇系列」研究之一，由盧乃桂教授與曾榮光教授主持，香港亞太研究所電話調查研究計劃負責執行。此調查的抽樣方法如下：首先，從最新的香港住宅電話簿（英文版）中隨機抽出若干電話號碼；為了使未刊載之住宅電話號碼也有機會被選中，將已抽選的電話號碼最後的兩個數字刪去，再配上由電腦產生的隨機數字，成為是次調查的樣本。第二步，當成功接觸住戶後，再抽取其中一名十八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作為訪問對象。調查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晚上六時至十時進行。抽樣結果如下：

抽選電話數目	4,529
線路有問題／非住宅電話	892
無人接聽（經 2 次不同時間嘗試）	1,411
接觸住戶數目	2,226
拒絕受訪	922
無適當被訪者／其他問題	323
成功訪問	981
成功接觸住戶後的訪問成功率	
= 成功訪問／（成功訪問 + 拒絕受訪）	
= 981／（981 + 922）= 51.6%	

調查結果（頻數及百分比分佈）

（1）「你相唔相信小學全日制可以提高小學教育嘅質素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相信	5	0.5
唔相信	148	15.1
相信	742	75.6
非常相信	35	3.6
唔知道／好難講	51	5.2
總計	981	100.0

（2）「你贊唔贊成政府略為增加每班小學嘅學生人數嚟達致小學全日制嘅目的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贊成	35	3.6
唔贊成	540	55.0
贊成	327	33.3
非常贊成	7	0.7
唔知道／好難講	72	7.3
總計	981	100.0

(3) 「你相唔相信中學增設兩個用英語為母語嘅老師可以提高香港學生嘅英語水平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相信	9	0.9
唔相信	223	22.7
相信	644	65.6
非常相信	33	3.4
唔知道／好難講	72	7.3
總計	981	100.0

(4) 「你贊唔贊成政府用更多嘅公帑嚟資助私立學校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贊成	17	1.7
唔贊成	342	35.0
贊成	497	50.9
非常贊成	15	1.5
唔知道／好難講	106	10.8
拒絕回答	4	缺值
總計	981	100.0

(5) 「你贊唔贊成政府批准 114 間中學用英語授課，而其他嘅中學全部要用母語授課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贊成	43	4.4
唔贊成	620	63.3
贊成	213	21.7
非常贊成	7	0.7
唔知道／好難講	97	9.9
拒絕回答	1	缺值
總計	981	100.0

(6) 「你相唔相信教育署將更多嘅權責下放俾學校係可以改善學校嘅管理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相信	8	0.8
唔相信	225	23.1
相信	607	62.2
非常相信	16	1.6
唔知道／好難講	120	12.3
拒絕回答	5	缺值
總計	981	100.0

(7) 「你相唔相信政府撥款五十億嚟成立優質教育基金，可以提高中小學嘅教育質素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相信	13	1.3
唔相信	221	22.6
相信	606	61.8
非常相信	19	1.9
唔知道／好難講	121	12.3
拒絕回答	1	缺值
總計	981	100.0

(8) 「你相唔相信政府撥款二千萬嚟設立教學專業議會可以提高教師嘅質素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相信	11	1.1
唔相信	251	25.6
相信	547	55.8
非常相信	9	0.9
唔知道／好難講	163	16.6
總計	981	100.0

(9) 「你贊唔贊成政府將 150 個本地學生嘅大學學位給予成績優異嘅內地學生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贊成	48	4.9
唔贊成	448	46.0
贊成	416	42.7
非常贊成	16	1.6
唔知道／好難講	46	4.7
拒絕回答	7	缺值
總計	981	100.0

(10) 「你贊唔贊成大學錄取一啲嘅非學術領域方面（例如體育同藝術）表現出色嘅學生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贊成	5	0.5
唔贊成	130	13.3
贊成	753	76.9
非常贊成	30	3.1
唔知道／好難講	61	6.2
拒絕回答	2	缺值
總計	981	100.0

(11) 「你相唔相信政府再培訓計劃可以幫助到失業人士提高轉工嘅機會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相信	42	4.3
唔相信	431	44.2
相信	406	41.6
非常相信	16	1.6
唔知道／好難講	80	8.2
拒絕回答	6	缺值
總計	981	100.0

(12) 「你相唔相信將九月十日定為敬師日可以發揚尊師重道嘅精神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相信	31	3.2
唔相信	362	37.1
相信	505	51.7
非常相信	10	1.0
唔知道／好難講	69	7.1
拒絕回答	4	缺值
總計	981	100.0

(13) 「你相唔相信學校採用資訊科技可以提高『教』同理『學』嘅成效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相信	4	0.4
唔相信	80	8.2
相信	776	79.5
非常相信	48	4.9
唔知道／好難講	68	7.0
拒絕回答	5	缺值
總計	981	100.0

(14) 「你相唔相信推行資訊科技教育可以幫助香港成為科技創新中心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相信	2	0.2
唔相信	185	19.0
相信	640	65.6
非常相信	21	2.2
唔知道／好難講	127	13.0
拒絕回答	6	缺值
總計	981	100.0

(15) 「整體嚟講，你滿唔滿意特區政府喺過去一年嘅教育政策施政呢？」

	頻數	百分比
非常唔滿意	26	2.7
唔滿意	423	43.4
滿意	310	31.8
非常滿意	4	0.4
唔知道／好難講	211	21.7
不適用	7	缺值
總計	981	100.0

個人資料與教育政策態度之間的相關係數

	年齡	教育程度	個人每月收入	家長
題 1	0.133**	-0.066*	0.017	0.048
題 2	0.151**	-0.127**	-0.071	0.018
題 3	0.150**	-0.153**	-0.111**	0.013
題 4	0.173**	-0.094**	-0.009	-0.060
題 5	0.152**	-0.093**	-0.033	-0.052
題 6	0.177**	-0.132**	-0.042	0.038
題 7	0.186**	-0.159**	-0.052	-0.027
題 8	0.173**	-0.197**	-0.073	-0.005
題 9	0.055	0.014	0.109**	-0.122**
題 10	0.128**	-0.092**	0.08	-0.089*
題 11	0.033	-0.044	0.027	-0.055
題 12	0.258**	-0.265**	-0.153**	0.028
題 13	0.173**	-0.197**	-0.061	-0.066
題 14	0.184**	-0.176**	-0.056	-0.013
題 15	0.128**	-0.128**	-0.083*	-0.022

* 顯著度 0.05 (雙尾)；** 顯著度 0.01 (雙尾)。

請問你今年幾多歲呢？

	頻數	百分比
18 歲 – 20 歲	112	11.5
21 歲 – 30 歲	241	24.8
31 歲 – 40 歲	327	33.7
41 歲 – 50 歲	199	20.5
51 歲 – 60 歲	53	5.5
61 歲或以上	38	3.9
拒絕回答	11	缺值
總計	981	100.0

「請問你係唔係已婚人士呢？」

	頻數	百分比
唔係	343	35.2
係	631	64.8
拒絕回答	7	缺值
總計	981	100.0

「請問你有無仔女喺學校讀緊書呢？」

	頻數	百分比
無	206	32.8
有	422	67.2
拒絕回答	3	缺值
不適用	350	缺值
總計	981	100.0

「請問你而家有無做嘢呢？」

	頻數	百分比
無（失業／待業／學生／主婦／退休）	353	36.3
有（全職／兼職）	620	63.7
拒絕回答	8	缺值
總計	981	100.0

被訪者個人每月收入

	頻數	百分比
四千以下	9	1.6
四千至七千以下	35	6.1
七千至一萬以下	95	16.7
一萬至一萬四千以下	157	27.5
一萬四千至一萬七千以下	64	11.2
一萬七千至二萬以下	53	9.3
二萬至二萬四千以下	62	10.9
二萬四千至四萬以下	59	10.4
四萬或以上	36	6.3
拒絕回答／收入不定	50	缺值
不適用（沒有工作人士）	361	缺值
總計	981	100.0

被訪者教育程度

	頻數	百分比
無受教育或幼稚園	17	1.8
小學	118	12.2
初中（中一至中三）	181	18.7
高中（中四至中七／工業學院）	444	45.9
大專或以上	208	21.5
拒絕回答	13	缺值
總計	981	100.0

被訪者性別

	頻數	百分比
男	466	47.5
女	515	52.5
總計	981	100.0

參加者名單

- 召集人： 盧乃桂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
 鍾宇平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 講者： 張文光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席）
 曾鈺成 （民主建港聯盟主席）
 程介明 （香港大學副校長）
 曾榮光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
- 嘉賓： 孔繁盛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文綺芬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王啓淞 （教育顧問）
 甘秀雲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親職教育及幼兒院服務主任）
 何偉傑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何瑞珠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何樂生 （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李子建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育學系副教授）
 李志良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導師）
 李芳樂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李國良 （德望中學校長）
 周健林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 周漢光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育學系副教授）
 林孟秋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胡文明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校長）
 馬慶堂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躍進學校計劃學校發展主任）
 區綺雯 （寶血女子中學校長）
 許世全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許為天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校長）
 郭民亮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校長）
 郭偉祥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校長、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兼任講師）
 陳永平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校長）
 陳玉楷 （保良局胡忠中學校長）
 陳志明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導師）
 陳展鳴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學系副教授）
 陳徐守琪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校長）
 陳運家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學系導師）
 陳德恆 （培正中學副校長）
 麥 釗 （華英中學校長）
 湯遠明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導師）
 程汝初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副校長）
 馮文正 （基法小學校長）
 彭新強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黃秉坤 （荔景天主教中學校長）

- 黃美美 (德貞女子中學校長)
 黃淑儀 (德蘭中學校長)
 黃顯華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育學系副教授)
 楊少雄 (聖約瑟英文中學校長)
 楊玉華 (北角協同中學校長)
 楊立門 (教育統籌局副局長)
 趙志成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躍進學校計劃計劃協調主任)
 趙垣林 (天主教培聖中學)
 劉兆佳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劉國強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劉顯奇 (佛教黃允畋中學校長)
 鄧惠欣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生)
 鄧薇先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下午校校長)
 蕭 今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蕭麗萍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育學系副教授)
 戴汝悅 (民權黨陸恭蕙議員助理)
 謝均才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謝洪森 (救恩書院副校長)
 鍾陳麗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顏永強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老師)
 魏雁濱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香港特區教育的再發展

論董特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

摘要

此論壇分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先後由張文光、曾鈺成、程介明及曾榮光發言，內容針對董特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內有關教育再發展的主題討論，所涉及的範圍包括資訊科技教育、師資培訓及專業化、優質教育、私校發展、語言政策及家長在學校的角色等等。第二部分則公開讓參加是次論壇的中、小學老師、大學學者和對教育政策研究有心得的人士發表意見及提問，最後再由四位講者回應結束。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Edited by

Leslie N. K. Lo

Wing-kwong Tsang

Abstract

The forum was divided into two sessions. Mr Cheung Man-kwong, Mr Tsang Yok-sing, Prof. Cheng Kai-ming and Prof. Tsang Wing-kwong in the first session delivered speeches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raised in the second Policy Address of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issues covered IT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ism, 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private schooling, medium of teaching and the role of parents in schools. The second session was an open discussion. Participants includ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university scholars and those who were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Finally, the four speakers responded to questions raised in the forum and drew final conclusions.